

论郑振铎在二十世纪小说研究的重要地位

谢超凡 欧阳健

【摘要】郑振铎与胡适、鲁迅同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学确立的重要人物。与胡适、鲁迅相比，郑振铎在两个方面更为突出，一个是重视俗文学的研究，关注不为人重视的小说、戏曲等通俗文艺，编著了《中国俗文学史》和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；一个是重视小说版本对小说研究的重要性，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文献。

【关键词】郑振铎 俗文学 小说版本

我国古代通俗小说虽处于不断的发展中，并赢得广泛社会阶层的喜爱，但它又始终处于“小道”之地位，没有得到官方和传统力量的承认，正如康来新先生所言，小说在当时社会上“确实有其地位，却始终处于不明不白的尴尬区。”¹故鲁迅有言，“在中国，小说不算文学，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，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。”²二十世纪初期，梁启超诸人倡导“小说界革命”，小说成为救国救民的利器，地位空前提高，慢慢的吸引了一批学者进入小说的研究。正如胡适 1923 年所言：“小说向来受文士的蔑视，但这几十年中也渐渐得着了相当的承认。”³

由于处于十家之末的小说历来都不能进入“文以载道”的文学殿堂，而是处于自生自灭的发展状态，缺少足够的学术积累，大量作品湮灭失传，作家、版本亦有待廓清，因此与中国古代的诗文辞赋等文类研究不同，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小说史料的收集与整理。如鲁迅在撰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过程中，曾感叹：“明清小说缺略尚多”，版本资料匮乏，“旧本希觐”，“观览又不周洽”，所以唯“当虑讹谬”，“诚望杰构于来者也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·后记》）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一批学者致力于小说史料的收集与整理，许多重要的古代小说材料不断被发现并卓有成就，对此，郑振铎曾感慨道：“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戏剧史的人，真要觉得如今是一个大时代。假如你写了关于这方面的一部书，每过了一二年，准保你要将你的著作修改一下。因为新的材料一天天的出现，逼得你不能时时刻刻的在搜集、在研究。”⁵而他们也成为中国小说学确立的奠基人物。

胡适、鲁迅、郑振铎三人可为此中翘楚，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，构建了古代小说研究的体系，使向来被鄙夷为“文学小道”的白话小说，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门学问的研究对象。郑振铎没有胡适“施耐庵、曹雪芹、吴趸人皆文学正宗”⁶的纲领，也没有鲁迅改变“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”的雄心，但无论文献的发掘蒐集，还是文本的阐释评骘，郑振铎都更称得上是小说研究的纯正典范。

郑振铎（1898—1958）一生于多个领域皆有涉猎，是著名的作家、文学史家、收藏家、考古学家，还是个文献学家，在版本学、目录学上有杰出的贡献。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在《追思》一文中说：“中国要是有所谓‘百科全书’派的话，那么，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。”

郑振铎自小喜欢古书，他在《中国文学研究·序》中提到“我没有跟从过名师，只有一位黄晦闻先生是我大学里的国文教师，他教的是古文，没有给我什么影响。但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乱看书，特别爱看古书。”⁷而郑振铎对古书的喜爱已超出经史子的范围，把目光投向不为前人所重视的俗文学，所谓俗文学，也就是与传统

¹（台湾）康来新：《晚清小说理论研究·绪论》，大安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五年（1986）六月初版，第4页。

²鲁迅：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100页。

³胡适：《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》日译本序

⁴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⁵郑振铎：《幻影》，《中国文学研究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32页。

⁶胡适：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五号

⁷郑振铎：《中国文学研究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页。

的“雅文学”相对应的“通俗的文学，就是民间的文学，也就是大众的文学。…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，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，而流行于民间，成为大众所嗜好，所喜悦的东西。”中国“俗文学”的范围很广，“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，凡重要的文体，像小说、戏曲、变文、弹词之类，都要归到‘俗文学’的范围里去。”⁸因为“在三十多年前，除了少数人之外，谁还注意到小说、戏曲的书呢？这一类‘不登大雅之堂’的古书，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。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。至于弹词、宝卷、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之类，则更是曲‘低’和寡，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。”⁹故郑振铎大力搜求各种古代通俗文艺作品，他说“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、小说、与夫宝卷、弹词，则余所得独多。”¹⁰这是他用心搜求的结果，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：“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，凡是罕见的，不管是印本抄本，残的破的，他都当做宝贝。”¹¹（《西谛书话·序》）而其一生也所获颇多，收藏了大量的珍贵古籍，即使在战乱中也不改变，“夫保存国家文献，民族文化，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，舍生卫国之男儿，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，得此千种百书，诚亦艰苦备尝矣。”¹²郑振铎编著了《中国俗文学史》和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对当时一些文学史家漠视变文、话本、弹词、戏曲等俗文学提出严厉的批评，说：“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，便永远地被一般喊着‘主上圣明，臣罪当诛’的奴性士大夫所占领着了么？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，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，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，使之歌，使之泣，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的名著，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？”（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·序》）¹³对中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研究做出很大的贡献。

郑振铎在俗曲、宝卷、弹词等方面的收藏上收获甚丰，而郑振铎的藏书是与自己的研究紧密结合的，并不是个单纯的藏书家，“奇书异本，每每视为珍秘，不轻示人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一个藏书家，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，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。有时连类而及，未免旁鹜；也有时，兴之所及，便热衷于某一类书的搜集，总之，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要的。”¹⁴因为，郑振铎深刻认识到“文献图书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需的工具之一。”¹⁵

在郑振铎的收藏中，小说的收藏占了很大一部分，“成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专藏。”¹⁶郑振铎早就有志于小说的研究，1925年，郑振铎在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鉴赏周刊》（第2至18期）发表了《中国小说提要》，展示自己的访书业绩，并言：“颇有野心欲对于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”，以改变中国小说研究“文献不足征”的局面，“一方面经自己搜集进一步的研究材料，一方面也可顺便的将中国小说的宝库的内容显示给大家。”¹⁷

诚如郑振铎在《中国小说史料·序》中称：“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，不外‘史’的探讨与‘内容’的考索。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，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，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。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，对于小说之‘史’的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。……‘版本’‘目录’的研究，虽不就是‘学问’的本身，却是弄‘学问’的门径。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，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‘目录’‘版本’的。而于初学者，这种‘版本’‘目录’，尤为导路之

⁸ 郑振铎：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页。

⁹ 郑振铎：《劫中得书记·新序》，《西谛书话》，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204页。

¹⁰ 郑振铎：《劫中得书记·序》，《西谛书话》，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207页。

¹¹ 郑振铎：《西谛书话》，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2页。

¹² 郑振铎：《劫中得书记·序》，《西谛书话》，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210页。

¹³ 郑振铎：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。

¹⁴ 郑振铎：《劫中得书记·新序》，《西谛书话》，三联书店1998年版。

¹⁵ 郑振铎：《劫中得书记·新序》，《西谛书话》，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204页。

¹⁶ 赵万里：《西谛书目》序，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。

¹⁷ 郑振铎：《中国小说提要·短序》，《中国文学研究》上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06页。

南针，照迷的明灯。”¹⁸说明史料性的考证对小说研究的重要性。

因正为有此种认识，所以郑振铎在收藏过程中，非常注重版本，诚如叶圣陶所言：“振铎讲究版本，好像跟一般的藏书家又不尽相同。”（《西谛书话·序》）¹⁹而版本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成为古代小说研究者的共识，与胡适、鲁迅相比，郑振铎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。

就胡适而言，他没有广泛涉猎小说版本，他关注的主要是《红楼梦》。他虽说做过《红楼梦》考证，“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，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，著者的事迹家世，著书的时代，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，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，这些问题乃是《红楼梦》考证的正当范围。”（《〈红楼梦〉考证》）²⁰这样的话，并且也曾正确指出：“有正书局的老板在这部书的封面上题着‘国初钞本《红楼梦》’，又在首页题着‘原本《红楼梦》’。那‘国初钞本’四个字自然是大错的。那‘原本’两字也不妥当。”但一旦见到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，立刻抛弃了自己对戚本“有总评，有夹评，有韵文的评赞，又往往有‘题’诗”，“可见已是很晚的钞本”的正确判断，转而认定这本同样有“重评”字样的本子“是海内最古的《石头记》抄本”了。

而鲁迅对古代小说的本子是重视的。他1909年秋至1911年底，据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玉烛宝典》、《北堂书钞》等，辑得《古小说钩沉》，中有散佚小说36种，共1400余篇。郑振铎曾取其所辑《青史子》、《笑林》、《郭子》三种，与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比对，认定“较精细，较谨慎，故便抓搜得更多”（《鲁迅的辑佚工作》）。²¹但进入白话小说领域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，鲁迅所下功夫就相对差得多。

如《关于〈三藏取经记〉等》说：“说起来也惭愧，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《小说史略》，而家无储书，罕见旧刻，所用为资料的，几乎都是翻刻本，新印本，甚而至于石印本，序跋及撰人名，往往缺失，所以漏略错误，一定很多。”²²《柳无忌来信按语》说：“我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，这才陆续编成的，当时限于经济，所以搜集的书籍，都不是好本子，有的改了字面，有的缺了序跋。《玉娇梨》所见的也是翻本，作者，著作年代，都无从查考。那时我想，倘能够得到一本明刻原本，那么，从板式，印章，序文等，或者能够推知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真姓名罢，然而这希望至今没有达到。”说明鲁迅已经意识到版本对于小说研究的重要性，只是“这三年来不再教书，关于小说史的材料也就不去留心了。”²³并没有像郑振铎那样倾力于版本的收藏，或者重视新材料的发现，郑振铎曾言：“因了新材料的不断发现，对于已有的材料的观念，也便联带的发生了不同的观点，也会得到了与前不同的新考察与价值。”（《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记》）²⁴

鲁迅说他“家无储书”，就小说而言，大致是事实。最成问题的是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，反以“凡所泛览，皆通行之本，易得之书”（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）²⁵而自负；怀着此种执拗意念，竟使他说出“近几年来，域外奇书，沙中残楮，虽时时介绍于中国，但尚无需因此大改《史略》，故多仍之”这种不负责的话，并且惹出了麻烦来。如1926年12月，鲁迅看到德富苏峰《鲁迅氏之〈中国小说史略〉》，对《史略》第十三篇云“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》或为元人撰”提出质疑，苏峰以“未见这两书的原板”，质疑鲁迅的研究资格；又说他“未读罗氏此文”，质疑他的研究态度，说：“这不但作为宋槧的稀本；作为宋代所著的话本（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），也最可珍重的的罢。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，‘此书或为元人撰，未

¹⁸孔另境：《中国小说史料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页。

¹⁹郑振铎：《西谛书话》，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2页。

²⁰岳麓书社1999，第77页。

²¹《文艺阵地》第2卷第2期，1938年版。

²²鲁迅：《华盖集续篇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03页。

²³鲁迅：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295页。

²⁴《郑振铎文集》第6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

²⁵鲁迅：《鲁迅书信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，第319页。

可知矣。’过于太早计了。”（《关于〈三藏取经记〉等》）²⁶因了“轻轻地断定”五字，鲁迅大不高兴，道是：“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，我的‘疑’是存在的。待证明之后，就成为这样的事：鲁迅疑是元刻，为元人作；今确是宋槧，故为宋人作。无论如何，苏峰氏所豫想的‘元人著作的宋版’这滑稽剧，是未必能够开演的。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，每容易迷眩一般读者，使之失去冷静，坠入彀中。”（《关于〈三藏取经记〉等》）²⁷这就将学术争论引到人身攻击上了。

《中学生》1931年新年号发表郑振铎《关于〈唐三藏取经诗话〉》一文，再次提出这个问题。文中说：“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，但王国维氏据书末：‘中瓦子张家印’数字，而断定其为宋槧，语颇可信。故此话本，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。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。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《西游记》杂剧，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《西游记》杂剧之前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。而‘中瓦子’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，而没有什么疑义。”但鲁迅仍坚持一己之见，又以杂文笔法作答辩道：“郑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谓‘人’，其实就是‘鲁迅’，于唾弃之中，仍寓代为遮羞的美意，这是我万分惭而且感的。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，而亦不宜墨守，世间许多事，只消常识，便得了然。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，史家则不然。故于旧书，不以缺笔定时代，如遗老现在还有将儀字缺末笔者，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；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，如我生于绍兴，然而并非南宋人，因为许多地名，是不随朝代而改的；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，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，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。”（《关于〈唐三藏取经诗话〉》的版本）²⁸这种态度就大不可取了。因为对于版本考证来说，最重要的是细心寻找客观证据，“世间许多事，只消常识，便得了然”的态度，是不免要犯错误的。尤为可议的是，鲁迅竟将此上升为原则性的分歧，讥讽拥有珍本善本的郑振铎，道是：“郑君治学，盖用胡适之法，往往持孤本秘笈，为惊人之具，此实足以炫耀人目，其为学子所珍赏，宜也。”（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）²⁹

在这次论辩中，鲁迅固持己见，但在研究中，曾多次引用郑振铎的成果，甚至向比他年轻一辈的郑振铎公开承认“错误”，如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日本译本序》说：“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《四游记》中的《西游记》是吴承恩《四游记》的摘录，而并非祖本，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，那精确的论文，就收录在《痴庵集》里。”³⁰但重视珍本秘笈，决不是炫耀博学，也不是“胡适之法”，而是地道的“清儒家法”。《小说旧闻钞》再版序言说：“此十年中，研究小说者日多，新知灼见，洞烛幽隐，如《三言》之统系，《金瓶梅》之原本，皆使历来凝滞，一旦豁然；自《续录鬼簿》出，则罗贯中之谜，为昔所聚讼者，遂亦冰解，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！然此皆不录。所以然者，乃缘或本为专著，载在期刊，或未见原书，惮于转写，其详，则自有马廉、郑振铎二君之作在也。”³¹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体例上，鲁迅采用了郑振铎的意见，如《题记》手稿原作：“郑振铎教授之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，亦殆非肤泛之论也。”但在正式出版时却又加以隐讳，改作：“中国尝有论者，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，亦殆非肤泛之论也。”

郑振铎之所以重视小说版本，原因就在他认识到版本的板式、印章、序文等，实是考订版本真伪、先后、优劣不可或缺的凭证，可借以判明小说的成书年代，弄清小说的成书过程。它既属于“史”的探讨，也属于“内容”的考索。

²⁶鲁迅：《华盖集续篇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02页。

²⁷鲁迅：《华盖集续篇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04—205页。

²⁸鲁迅：《二心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83—84页。

²⁹鲁迅：《鲁迅书信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，第319页。

³⁰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30页。

³¹鲁迅：《小说旧闻钞》，齐鲁书社1997年版。

判明小说的成书年代，是对它进行全面研究的前提。郑振铎曾举的《水浒后传》，题“古宋遗民著”、“雁宕山樵评”，康熙甲辰（1664）刊本，内封上横镌“元人遗本”四字，“识语”谓：“宋遗民，不知何许人，大约与施罗同时，特姓名弗传，故其书亦湮没不彰耳。”如果据题署的“古宋遗民”和内封上的“元人遗本”，将此书定为元人作品，自然已是大错；如果据书中雁宕山樵序后所题“万历戊申（1608）秋杪”，以为此书曾有过明代刊本，也是错的。

古代小说的成书过程，一般都比较复杂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也要凭借版本的考证。鲁迅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评论《三国演义》说：“三国底事情，不像五代那样纷乱；又不像楚、汉那样简单，恰是不简、不繁，适于作小说。而且三国时的英雄，智术武勇，非常动人，所以人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。再有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甚为详细，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。至罗贯中之《三国演义》是否出于创作，还是继承，现在固不敢草草断定；但明嘉靖时本题有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，明罗本编次’之说，则可见是直接以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为蓝本的。”³²将小说的成功归于题材之“优越”，遂轻易地抹杀了罗贯中的创造。鲁迅对《三国志演义》的论断，源于对其成书过程的简单理解。而郑振铎却道出了问题的关键，他将平话与演义联系起来，说：“在很早的讲史里，讲述者多半是牵引历史以拍合于野语村谈的。故往往荒唐怪诞之事百出。然气魄是弘伟的。”（《宋元话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》）³³讲史平话的气魄，首先在藐视一切正统史书的规范，创造了一个为市民群众抒意写愤、寄托情志的另一个历史世界，开辟了中国小说史的新纪元。郑振铎又说：“在小说艺术未臻完美之前，长篇著作是很难着手的，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，才可能得到了长篇。”（《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》）讲史的宏伟规模，以及说话所用的通俗语言，使历史演义式的长篇巨著的问世成为可能。他更指出罗贯中“是一位继往承来，绝续存亡的俊杰，站在雅与俗、文与质之间的。他以文雅救民间粗制品的浅薄，同时又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”（《宋元明小说的演进》）³⁴；“以文雅救民间粗制品的浅薄”，既是罗贯中创作的原动力，也是罗贯中追求的最终目标，而“历代演义”的全新样式，则是他为达此目标的天才创造。

鲁迅对于有世俗化倾向的历史说部评价不高，郑振铎却给以“她是出生于民间，为民众所写作，且为民众而生存的。她是民众所嗜好，所喜悦的；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”³⁵的崇高评价，如说：“《说唐传》的叙述虽多粗鄙可笑处，而其情景的敷设，却甚为动人，若叔宝的卖马，雄信的拒降，皆为极不朽的气概凛然的章段，足以与《水浒传》并驾齐驱的。英雄传奇恐怕也就这一部《说唐传》而已，可惜不曾有人表彰过，遂致不得登于文坛，为骚人学士所称颂。”（《宋元明小说的演进》）³⁶对于鲁迅误读的《续金瓶梅》，郑振铎指出：“所叙在异族铁骑的侵略下的人民的生活情况，尤翩翩欲活。盖缘作者是身经此痛，故写来便格外真切可怕。”³⁷（《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》）凡此种种对于“内容”的考索，所得的结论，都是正面的和积极的。

基于这一根本认识，一生“爱书如命”的郑振铎，以一介寒儒，常常倾其囊中所有来买书，一些劫中鲜为人知的古籍版本，在他竭尽全力抢救下，得以发现和保存。如沈氏萃芬阁藏万历刻本《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臣英烈传》，孤本《京楔皇明通俗演义全像威南塘剿平倭寇志传》等等，都是郑振铎抢救出来的小说珍本。

鲁迅去世后，郑振铎在《永在的温情》中说：“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，完全像盲人骑瞎马，乱闯乱摸，一点凭藉都没有。只是节省着日用，以浅浅的薪入购书，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，作为研究的资源。

³²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334 页。

³³ 《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406 页

³⁴ 《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381 页。

³⁵ 郑振铎：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4 页。

³⁶ 《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394 页。

³⁷ 《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456 页。

那时候实在贫乏得、肤浅得可笑，偶尔得到一部原版的《隋唐演义》却以为是为了不得的奇遇，至于《三言》之类的书，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读到。他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出版，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。”³⁸对鲁迅曾经的帮助念念不忘，充分显示了学者的气度，堪称小说研究的典范。

谢超凡：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，430074。Xiechaofan@163.com

欧阳健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，350007。fuzhai@foxmail.com

³⁸ 张新颖编《鲁迅印象》，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5页。